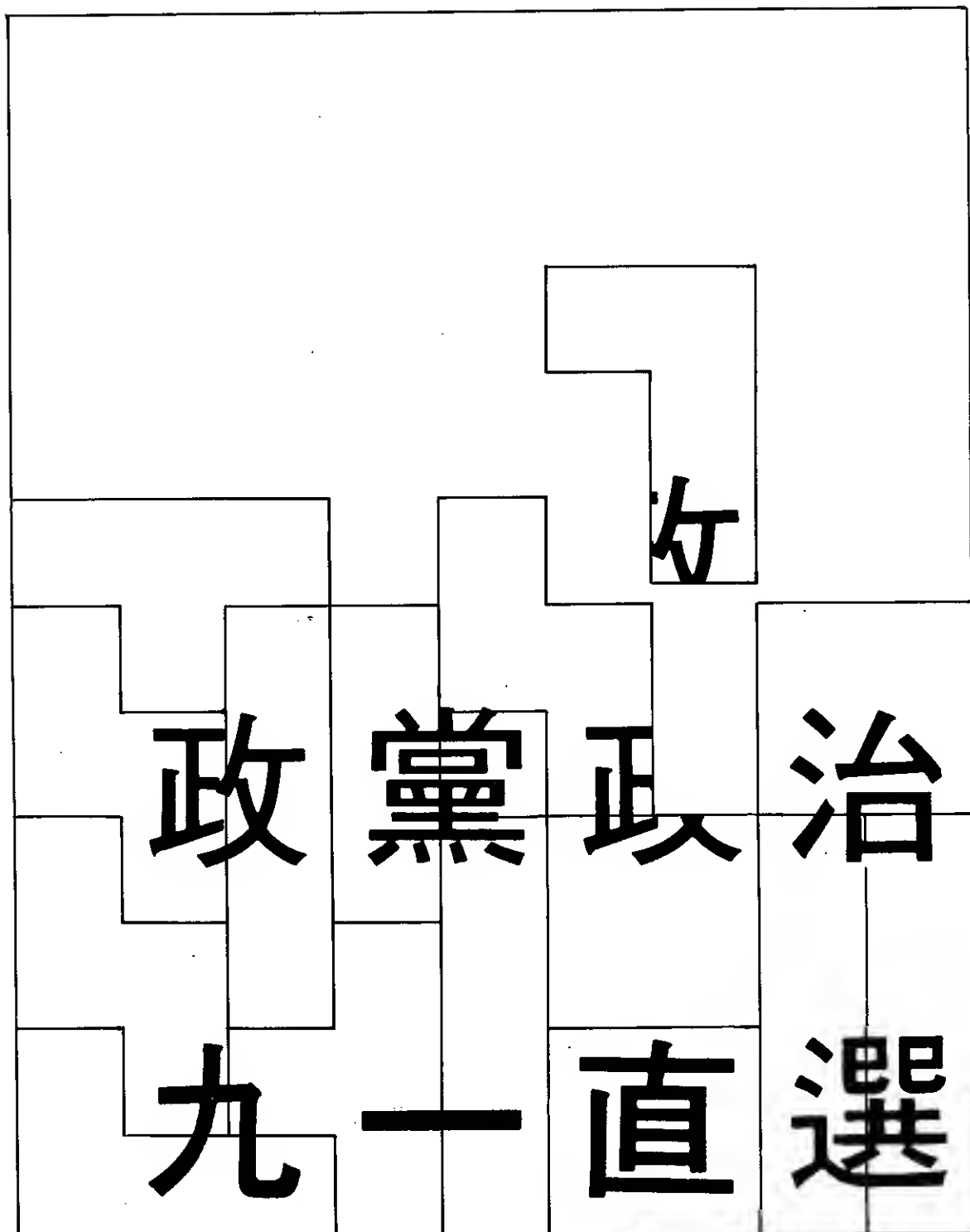


一 九 探 專 科 社



S S S
H K U S U

目 錄

前言	1
走訪紀錄	
— 港同盟	2
— 滙點	3
— 自民聯	5
政黨的定義	7
政黨發展的客觀因素	8
三個政治組織的剖析	10
鳴謝	15

前言

九一年是立法局有史以來第一次舉行直接選舉，在香港民主政制的發展中開啓了歷史的一頁。在這次選舉中，有很多的政治組織十分活躍地參與大規模的選舉，無論在資金、人力動員以至各政治團體之間激烈抗爭的局面，都是香港政治舞台上前所未見。

從這些可見的跡象中，我們可以觀察到各政治組織都以今次選舉作為試金石，作為日後部署本身政治實力的參考，而且不少的政治組織聲明不排除將來會發展成為政黨的可能性，政黨實是一個不可忽略的政治課題。因此，社科專探九一籌委會把握身處的歷史時空，決定選取政黨的發展前景作為社科專探九一的主題。

整個社科專探九一包括了研習小組、展覽、走訪、講座及這本特刊等，而這本特刊是整個專探的總結，將研習及走訪所得的資料，安排在這特刊內，作為一個紀錄及與大家交流的機會，或許日後政黨政治的模式在香港有所發展的話，這本冊子也可給我們一些資料作為參考。

最後，本人必須在此感謝各位曾經協助社科專探九一的人士，沒有你們的支持，社科專探九一只可能是一個不可落實的構思和概念。

社科專探九一籌委會

主席：蔡子榮
市場主任：梁穎莊
財務秘書：梁啟宏
節目秘書：梁家成
出版秘書：高漢健
宣傳秘書：陳志雄
籌委：黃麗青
黃嘉寶
黃肇恆
陳家慶
趙持斌

走訪紀錄

港同盟



受訪者：羅致光*

問：請問你對政黨有什麼看法？

答：本人對政黨沒有具體的看法，皆因港同盟作為一個政治組織，本身並沒有概念上的限制，同時在港同盟的正式文件上沒有出現「政黨」這個名稱。不過一般人稱港同盟為政黨，本人並不反對。

問：請問成立港同盟有什麼目的？

答：主要可分為四點：首先是成為一個有實力的小數派，壯大本身的政治力量；其次，爭取對政治及社會政策的影響力，就如九一年立法局直選，很多港同盟成員均能入局，在建制內發揮其影響力；還有，使「港人治港」這目標落實；最後，為爭取建立一個民主、自由及公義的社會。

問：請問中國政府對港同盟有何影響？

答：在發展的過程中，有需要考慮中方對香港影響之因素，然後再決定目標和理想。港同盟不會視中國為發展的阻礙，反而視之為競爭對手。中國在過渡期內會嘗試擴大其影響力，因中共的統治哲學就是加強控制。

問：請問港同盟在處理中方關係時有什麼對策？

答：港同盟會盡量爭取本身在香港的勢力，有矛盾時，依然盡力保持原則，但不排除合作的可能性。在實際利益的問題上，港同盟是與中方試圖進行溝通。

問：因基本法對未來政制發展有很大限制，請問港同盟抱什麼態度和策略應付這問題？

答：港同盟會在限制範圍內爭取主導性和影響力。儘管基本法限制了立法議會的直選議席，但港同盟會盡力表達民意，在建制內爭取。

問：請問你覺得香港的政治文化對未來政制及政黨發展有什麼關係？

答：當政治文化發展得很好的時候，政制發展需要同時加快步伐，但礙於客觀形勢上的限制，政制發展的速度難以加速。至於直選方面，九一年立法局的選舉大大增加了一般羣眾的政治文化，讓市民有參予的機會。而香港一向以來，都強調共識政治文化，壓抑了政治文化的發展。由於訊息多的時候，市民需要思考吸納，自然政治文化的基礎便能有所發展。

問：港同盟在培養人才方面有什麼計劃？

答：港同盟現時除了參政，還需要培養人才去處理黨內事務。當然，港同盟也嘗試在適當的情況下，讓各成員在各級議會中，例如區議會及市政局，發揮本身的才能，亦同時吸取在議會中參政的經驗，為日後進入立法局或擔任更重要的決策工作而鋪路。這是一個長遠的計劃。

問：請問港同盟的財政狀況是否穩定？

答：港同盟本身的確需要很多資金去維持日常的運作開支，故此港同盟會舉辦籌款活動，以便有充裕的資金。事實上，港同盟需要每年籌款二百萬元以上才能維持下去。

* 羅致光先生為港同盟的中央常務委員。



受訪者：張炳良*

問：一九九一年是香港立法局首次舉行直接選舉，其重要性何在呢？

答：其實早在六、七十年代，已經有人提出直選，但真正得到體現，其實是八十年代的事，如八四年爭取八八直選，八七再度爭取等；可惜兩次均告失敗，直至九一年才有立法局直選議席。姑勿論有多少直選議席，立法局直選已標誌着香港已邁向民主，市民可透過社會壓力及不同的議員帶起監察政府的作用。雖然如此，我們亦不能高估直選後立法局的重要性，因為當政府遇有重大決策的時候，政府會利用委任議員來壓倒直選議員，即使十八位直選議員聯合一致，也未必可以推翻政府的決定。總括而言，香港在九七年前是一個高度由行政機構帶動的體制，立法局的地位是被動多於主動。

問：你對於那些身兼幾個議會的議員有何看法？他們會否有角色衝突呢？

答：我個人不反對議員身兼數個議會的職務，只要他們能分配時間和有足夠的精力便可。即使那些不是幾個議席的議員，他們同樣是身兼數職，有些人對議程走馬看花，開會時臨時「執生」，這些情形都是常見的。至於角色矛盾方面，行政局是幫助政府決策事務，做政府的顧問，是政府的一部份。所以，一位身兼行政、立法兩局的議員是沒有可能同時幫助政府決策而又能監察政府。本人並不反對身兼行政、立法兩局議員，但他們必須將角色劃分清楚，這才是遊戲的規則。

問：你認為香港人是否有足夠的政治意識來選擇一個能代表自己的議員呢？

答：這個問題實在很難解答，因為選民不投票並不代表他們不參予，或許他們心目中沒有理想入選，所以很難估計他們政治意識的強弱。個人而言，選民選擇議員是看他們對該議員有甚麼期望，例如，他們是否可以監察政府，是否可以為社會爭取利益等。由於香港的地區主義較強，選擇議員的心態與外國的選舉截然不同。

問：九一直選期間，很多團體都標榜自己為政黨，但縱觀香港現時的政治環境，似乎沒有多大的空間容許政黨政治。那麼你對香港將來會否出現政黨政治，有否抱着樂觀的態度？

答：以我個人理解，政黨政治必須具有以下幾項條件。(一)選舉以政黨為分界。(二)政府以政黨為基礎。(三)議會運作以政黨為依歸。但以現階段來說，我對於香港政黨政治的發展並不樂觀。以理性的角度分析，政黨在選舉中是必須的，選民可從政黨過去的政績來幫助他們了解屬於這個政黨的候選人，令選舉更有理性，選民有所依據，避免不可預測的後果。但從現實的角度來看，香港九七年前後政制的設計，都以功能團體作為主流，而功能團體的存在，扼殺了民主政黨的發展。因此，香港政治制度的設計造成了政黨難在短期內起巨大的作用和突破。再者，資源和人力方面亦不能滿足一個政黨政治的需求，就以九一直選為例，所需的資源和人力之大，是以往各級議會選舉不能媲美的。

問：你會否認為中國政府是香港政黨發展的一個障礙呢？

答：以往中方一直不看好政黨的發展，原因是怕香港的政黨會受外來的影響而對中共挑戰。但在八八年尾，八九年初中共已消除了這個疑慮，中共官員已開始對政黨變得中立，甚至容許，接受政治團體（非政黨）的出現。由此可見，中共接受政黨的出現，但不容許他們挑戰中央。

問：既然香港政黨發展有限，而基本法又規限了政制的發展，會否影響民主的過程？

答：這要看中國的政局了。若內地能夠繼續開放政策，香港爭取民主的空間自然會較大。而實現民主，必須逐步建立，例如認為那些既得利益者認為民主政制不會剝削他們的利益和令一般市民認為民主化是有利無害的。如果民主的好處不能得到廣泛的認同，空口講民主也是徒然的。

問：綜觀今屆立法局選舉，候選人在政綱多是光打響口號，吸引選民，而缺乏整體性的長期跟進工作，會否做成一種不健康的現象呢？

答：由於今次是香港的第一次立法局直選，無論各政治團體，候選人及傳播媒介的經驗都不足，一切均是在逐步建立之中，故此政綱的不足和缺乏是可以理解的。

問：以前的民主派多持反對的聲音，但如今藉選舉進入建制之內，外在反對聲音會否因而減少呢？

答：我個人不覺得民主派的政治團體能夠包攬一切，民間的社會依然存在，地區居民，工會等組織依然繼續發展，而這些團體亦會有監察民主派在建制內的功能。

問：你個人認為「港人治港」的目標能否在香港體現呢？

答：中共政府最想看到的，是繼續維持香港對他在經濟上的利益，幫助促進國內的現代化。對中共而言，最理想是由港人管治香港，一方面避免矛盾，使香港人心服口服；另一方面又能維持自己在香港經濟上的既得利益。所以「港人治港」這個政治模式是能夠體現的。

問：你認為現今學屆和學生應該在那些位置和扮演甚麼角色呢？

答：他們的位置應是非建制的，應該扮演建制以外的聲音，做社會的良知，獨立地去看問題，亦不需有太大的顧忌，盡量發表己見。

* 張炳良先生為滙點主席。

組織結構：

會員大會是滙點最高權力機關。每年召開一次。大會期間外，一切會務由評議會及執行委員會依章處理。

評議會負責制訂指導性原則，通過方向性的政策，監察及審議執行委員會的工作。

執行委員會是滙點的行政機關，處理日常會務，執行會員大會及評議會的決定。執行委員會下設秘書處，政策委員會（政治、法律、經濟、城市發展、社會政策及文化教育），工作小組（如基本法跟進小組）和工作部（如課程部），協助推動會內各項工作。



受訪者：郭志權、譚超雄*

問：郭先生覺得這次九一立法局直選意義何在？

答：這次選舉是新的里程，但本人覺得有改善之處：首先，準備時間過短，香港不似英國每選區只有數萬選民，香港的選區太大，每區有十多萬人，因此，準備工夫未能充足；其次，在傳播方面，現時西方國家的選舉多運用電子媒介，可是香港的法例仍未容許。報紙可以容許政治廣告，為何電子傳媒不可？政治活動是合法，正當的，是宣傳公民教育和鼓勵一般青少年將來參政以及港人治港的有效方法，為何不容許運用最有效的傳媒？除此之外，人手和經費亦構成問題。本人覺得這次選舉所做的工夫不夠，雖然有區議會的經驗，但由於選舉規模很大，未能準確估計所需人手，因而感到吃力。

問：現時政黨林立，貴黨有何佔優之處？

答：本人反而認為身處劣勢，因我們的立場較溫和、務實，又非時常舉辦激烈行動或遊行，因而感到在大型政治活動處於不利地位。原因是立場溫和就不為傳媒注意，加上我們起步較遲（自民聯成立於九零年十一月），而其他政黨成員在多年時已活躍於政壇和壓力團體。雖然我們的班底和起步較為吃虧，但我們有長遠的計劃，而且在這次直選失敗的候選人仍繼續在區內發展會務和關注民生。其實這次直選也有不少正面幫助，主要是有了發展會務的基礎，亦可以凝聚會員合作，為市民服務。

問：現時有不少政治團體紛紛成立，香港這個細小空間能否完全容立？又會否形成像新加坡一黨獨大的局面？

答：我認為西方民主模式確是勞民傷財，但這亦是代價。香港議會將來有功能和直選議席，一黨獨大是沒有可能的，因為選民來源不同。而且香港不似新加坡有一段時間由英政府培育一政黨（李光耀等人）接班，而且中國政府亦不容許。本人只希望將來政治人物的「埋堆」，不會太散亂，同在一議會內互相尊重地運作。

問：貴會的最終目的是什麼？

答：基本上，我們由工商界人士發起，而香港從商的人也很多。香港有高度自由，商業發達，如香港要一國兩制成功，經濟發展是十分重要，以維持安定繁榮。中國構思一國兩制都是希望香港可以為其帶來更多益處；香港繼續扮演一個金融中心，亞洲高度自由的商埠，繼續協助中國推行四個現代化。經濟發展對港人治港很重要，但香港商人多只顧賺錢而不談政治，因此在現階段，工商界要鼓勵市民務實、循序漸進，而又兼顧經濟發展，以利香港。要實踐政客承諾及提高服務水平，費用何來？這可謂工商界存在的價值。我們注重社會福利與經濟收益相輔相承，一方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及各方面的服務，另一方面每套計劃都有一定經濟增長，缺一不可。

問：換言之，貴會是否認為工商界利益和市民福利，前者佔較大比重？

答：不是這樣的意思。工商界與市民利益十分密切。在香港，如工商業十分發達，對整體利益有利，這是我們的貢獻。我們在議會提出此聲音，後而使政策偏重某一方。如我們贊

成有普及性退休保障制度給予退休工人，但如果私人機構倒閉，工人的退休保障又如何？我們的政綱是支持這計劃，但要找出更有效和切合香港的方法。這是維持市民與工商界的利益，因此沒有矛盾。

問：什麼是民主？

答：民主是政府架構代表民意的最終目的，即政府制訂的政策符合民意。本人覺得民主是最理想，可令政府受到監管為市民服務，其所做的事為大部份人接受。

問：貴會以民主為旗號，而九一開始直選，你會否認為這路線對香港踏入民主，有利或有害？

答：本人認為議會由選舉產生是好的開始，不似委任制度，被委任者只向委任他的人負責。如果議員由選舉產生，則獲選者對選民有一定的責任，代表不同階層，是好的事情。

問：香港自由民主聯會將自由放首位，你們覺得追求是何物？

答：自由是指言論和個人自由。目前身處自由社會，可能不覺得其寶貴。但如果我們在新加坡便會醒覺；在新加坡非但不可亂說話，報紙也被政府控制，對外來雜誌亦控制其流量。所以，我們要珍惜和保持高度自由。

* 郭志權先生為自民聯副主席，譚超雄先生為自民聯執行秘書

會員的權利和義務

基本會員之權利

1. 參與本會活動
2. 依本會規章在本會內有提案及表決權利，並且可被選或委任為會員大會代表也可在所屬區支部有選擇和被選舉權。
3. 推薦合適人士加入本會
4. 可接受本會提名參加各公職選舉。
5. 可對本會提出建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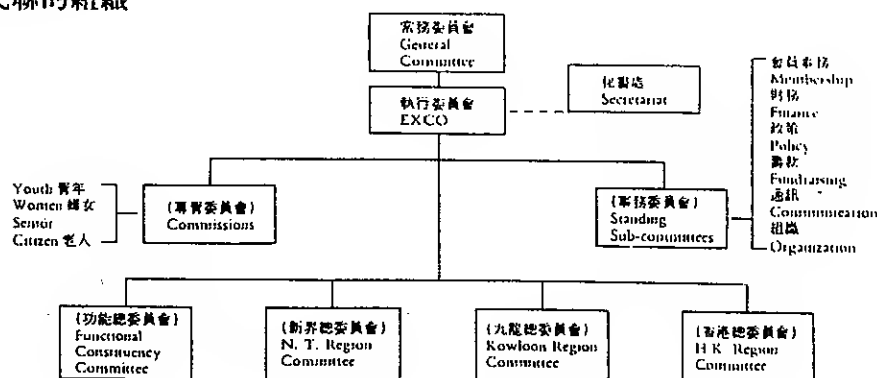
基本會員之義務

1. 遵守本會規章，決議和會員大會所制定之政綱。
2. 支持大會活動。
3. 宣揚本會宗旨和綱領

自民聯的政綱必須經會員大會通過，原則上

1. 凡非主要政策而只影響個別功能團體或地區之事項，會員可自己選擇立場
非主要政策如：墮胎法律，個別事項如：專業資格審核法例，何處設開放式越南難民營。
主要政策如：低稅率、自由貿易。
2. 主要政策由會員大會規定。

自民聯的組織



圖一

政黨的定義

在開始討論及界定政黨的定義之前，由於政黨這個概念是源自西方的政制發展中，故此本文會先從西方政制發展與政黨的出現，彼此之間關係作出分析，並且進一步根據其發展狀況，再界定政黨的定義。

自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後，整個歐洲在十九世紀均經歷了政治經濟上的改變，開始試行議會式的政治制度，至二十世紀初期，英、法等西歐國家的民主代議政制均告確立趨形。根據西方政治學者的研究，其中「建制理論」(Institutional Theories)認為政黨的出現皆因議會制度的發展及選舉的出現，直接地說明民主的選舉所產生的議會刺激起很多人的參政意慾，當一群有志參政的人，彼此之間的政見十分接近甚至相同的時候，他們便會進行政治集結，從而壯大本身的實力。

當然政治集結的活動只是形成政黨的初階，仿似現時在香港立法局內一些不屬於任何政治組織的議員也開始聯合其他政見相近的議員集結一起，用以加強本身在議會內的聲勢。如果選民面對無數沒有組織的候選人之時，同時所選出的一群議員，沒有任何組織去監察其工作表現及是否履行對選民所作的承諾，選民自然難以根據這群人的管治往績（紀錄在政黨的報告中）作為參考。另一方面，議會內的議員意見分歧，沒有黨派的分類，大大地減低了議會的運作效率。因此政黨的出現，配合民主選舉的機制，將可減低民主選舉可能出現的流弊，有利代議政制的議會制度有效地運作，並且使民主議會制度更有效地化解社會各利益集團衝突的問題。

就香港目前的實際情況來說，全部立法機關的議員根本未能全部通過直選產生，而將來的行政長官也只是通過一個八百人的選舉委員會所選出。故此我們必須針對香港的情況從新界定政黨的定義。由於基本法明確指出香港直至公元二零零七年才有可能改變以上所提的選舉方式。故此由目前至公元二零零七年，依照西方對政黨所下的定義，政黨是一個試圖通過選舉以奪取政權的組織，基於基本法的限制，這定義變得不切合香港現實情況。因此我們嘗試界定政黨為：「積極參與選舉及提出具體政策的政治組織，試圖通過在立法議會內僅有的直選議席作為民意的反映，從而進一步影響政府的政策及爭取八百人的選舉委員會選拔本組織的成員為行政長官，取得行政權力。」這個定義無疑是比較冗長，但是香港未來的發展實是帶着很多獨一無二的客觀因素。故此在界定一個合乎本港環境的政黨定義，需要提出較多具體的條件，但是又不能改變試圖執政這個原則，否則的話，所有較為活躍論政的壓力團體也定義為政黨，這便失去了定義本身技術分析的作用。

大家如能利用這個定義，深思這一問題之時能有較明確之路向，日後或許能提出更合適的定義，使這方面的研究更上一層樓。

政黨發展的客觀因素

在九十年代初期的香港社會，我們去分析或探討政黨政治在未來的發展前景之時，理所當然需要了解香港目前及未來可見的社會特殊因素，從而勾劃出一個比較清楚的概念，明白社會上各個重要的因素對政黨發展的限制。本文嘗試抽出三方面的特殊因素，從中分析其與政黨發展的互動存在之關係。這三方面包括了中國政府的態度、香港未來的政制及香港本身的社會政治文化。其實要分析香港對政黨發展的客觀因素，還可從多個層面與角度分析探討，但本文選取這個較具體明確的分類研究，希望讀者能從中的討論得到啟示。

首先，所謂中國政府的態度，當然是指中國政府對香港存在政黨的態度。其實，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後，確定了中國將會收回香港主權這個事實，無可置疑地中國政府對香港的影响力在不斷的擴大，故此在分析客觀因素之時，這是一個不可忽略的重要元素。

一直以來，北京對於香港是否應該有政黨存在，或具體地說是否讓政黨這樣的政治實體，參與各項政治活動這問題，中國政府本身沒有明確的態度，只是含糊地反對一切會擾亂香港經濟的改變。例如中方對英國及港英政府施加壓力，要求拖慢在過渡期之時立法局增加直選議席的速度，要求一切應該先考慮香港的經濟能否保持增長，在政治上的變革應該循序漸進，避免香港失去控制。

其實，要了解中方的態度，首先需要知道中方基於甚麼理由收回香港。開宗明義，中國是爲了領土完整統一，以一國兩制的構思先行解決香港的領土問題，並進一步爲收回台灣而作出試探。另一方面，中國自從實行開放改革政策之後，香港各方面的經濟優點對中國四個現代化有莫大的裨益和幫助，故此中方對香港的穩定和經濟效益十分重視。概括而言，中方收回香港主權是爲了領土統一及利用香港的經濟實力，協助其推行現代化的目的。因此，凡事只要不違反中國能在香港行使主權這名義，與及能保持香港經濟效益的事情，中方都會給予香港一定的自決權力，而在開放改革政策過程中，香港的確促進了整個廣東省的經濟發展，這個現象致使中國更加看重香港的經濟成果，對香港的態度均以保持安定繁榮爲依歸，只要不影响香港的經濟運作，中方也不會持着十分強硬的態度，避免影响本地資本家及外資的信心。

故此，中方對香港應否存在政黨這問題，也是從一個實際功利的角度去看，若果政黨的出現能夠增加香港在過渡時期，政制轉變的穩定性，加上這些政黨能夠真正與北京政府「河水不犯井水」的話，中國當然不會盲目地反對政黨的存在，這點可從本年一月之時，港澳辦主任魯平主動地接觸各個有可能成爲政黨的政治組織，由此可見中方對政黨的存在起碼已不強烈地反對，甚至有些人認爲中方已抱着默認的態度，容許將來政黨的發展。基於這個論據，中方的因素對政黨的發展已變得不是絕對的阻礙，當然我們需要假設將來中國政府對開放改革政策保持支持的態度，否則的話，整個分析便需要重新考慮，加上目前不能預見的變數，例如新領導層對改革政策所抱的態度，才可得出合理的預測。

除了中方的因素外，還有基本法中對香港未來政制的規範，也是我們需要考慮其與政黨發展的關係。從長遠的政制角度來看，政黨的發展是樂觀的，如基本法第四章四十五條中說明：「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如果地區首長由普選產生的話，很自然地催生了政黨的出現（參看前文《政黨的定義》），當然這個選舉是真正的民主差額選舉，否則如人民代表大會的等額形式化選舉，在政黨的分析中是沒有重大意義的。

但是，如果我們從較具體的政制角度去分析，情況當然不甚樂觀，由於基本法規定第一、二屆行政長官經一個選舉委員會選出，而這委員會只有八百人，它的產生方法，「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民主、開放的原則制定選舉法加以規定。各界別法定團體根據選舉法規定的分配名額和選舉辦法自行選出選舉委員會委員。」（基本法《附件一》）這個委員會是否具有廣泛代表性反映民意，目前也很難定論，皆因它選舉組成的方式十分含糊，根本難以確定它會否仿似美國選舉總統的選舉團（Electoral College），根據民意而選出行政長官，尚是未知之數。而且，基本法附件一中聲明：「二零零七年以後各任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如需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這意味要改變選舉委員會這選舉方法，明確地受立法議會及中央人大的控制，要過這兩關似乎不容易。

另一方面，立法議會內的議席，至二零零七年也只得半數由直選產生。由此觀之，基本法中巧妙地對政制的安排，壓制了直接選舉的規模，換句話說，如果我們認同西方政治學派中「建制理論」（Institutional Theories）的話（請參看前文《政黨的定義》），這即是削弱了一個政黨發展的有利因素。

最後一個我們要考慮的因素就是社會的政治文化。一直以來，香港市民生活在沒有政治空間的殖民地統治之下，參與政治本身並沒有發展機會及階級提升的回報，加上殖民地政府不鼓勵市民關注政治及公共事務，故此市民自然偏向非政治化的經濟活動，形成一種社會上對政治莫不關心的文化。

但是，踏入八十年代，市民受到一定程度的沖擊，由中英會談以至八九年六四事件；香港市民開始改變了一貫冷漠的政治態度。當然，在九一年九月的立法局直選中，有人認為投票率接近四成左右依然偏低，因此而定論香港人政治意識還不足夠及成熟。其實，隨着香港的教育水平日漸提高及普及，經濟有所改善，香港市民已開始隨着環境的變遷而改變舊有社會的政治文化。雖然這並不代表市民具有很成熟的政治意識，但是已經反映出香港已具備了發展成為「公民社會」的基本條件，在未來的日子裏，只要政府及各政治組織多做點公民教育的工作，讓市民能接受更多有關這方面的資料及思考訓練，對民主政制及政黨有更多的認識，從而填補市民思想落後於現實環境的差距，加以補充。從這角度分析，我們也應抱着樂觀積極的態度去面對政黨的出現，基於以上的討論和分析，香港的政治文化不再是對政黨發展的制約因素。

三個政治組織的剖析

九一年立法局直選議席的出現，催生了很多的政治團體，就以積極參選的數個政治組織來說，它們仍然處於發展的初階。雖然如此，這些活躍參政的政治團體本身並不排除成為政黨的可能性，而且它們並不單只為了立法局的直選而成立，更重要的是為了長遠的政治參與，部署將來在特區政府中佔據有利的位置，發揮本身的影响力，從而達致政綱的施行和政治理想的體現。

基於這個原因，本文嘗試將香港目前一些活躍參政的政治團體作一個剖析，讓我們對這些組織有較多的理解，並且從中得到一些政治上含意。可是我們沒有可能將全港的政治組織都包括在以下的分析中。故此筆者選擇了三個較具代表性的組織，作為我們的分析對象，這三個組織便是港同盟、自民聯及滙點。選取這三個政治組織是由於它們的代表性和積極參政的程度，當然沒有選取的組織並不表示它們的代表性不足，只是由於資源所限，故此只抽出三個政治團體作為分析對象。以下將會從三個層面去分析三個組織本身的特質及其發展成為政黨的困難，這三個層面是為(一)核心成員的背景(二)組織結構及(三)政綱。

(一)核心成員的背景

政治組織的核心成員處理團體內的重要事務，制訂長遠的發展方針，在香港這個剛剛起步發展民主政制的地方，各政治組織的結構及政綱仍然處於不太成熟的階段，故人事的因素是十分重要的，核心成員的背景和處事作風對其團體的發展起了舉足輕重的影響。

港同盟

港同盟的主要核心成員被稱為「民主派」，他們一貫的表現都以爭取民主政制為目標，例如爭取八八直選，支持八九年中國民運等社會運動中，在市民心中確立了爭取民主的鮮明形象。可是港同盟有這樣背景的領導層作為核心，對其日後有甚麼影響？首先他們鮮明的形象確實獲得部份市民一定的支持，以九一立法局直選中，港同盟的候選人差不多全部勝出，由此可見其鞏固的群眾基礎。當然這個基礎是受着很多的客觀因素影響的，如八九年六四事件中，港人明顯地對中國政府失去信心，故此支持「民主派」，從而滿足其抗共的心態。基於這個分析，可知港同盟要取得群眾支持的基礎，就需要付出「抗共」的代價，保持其民主的鮮明形象。

港同盟的核心成員由於極力表現其爭取民主的取向，加上六四事件中，港同盟（當時尚未成立）部份核心成員以支聯會的身份，強烈地表達對中方的不滿，造成兩者之間的惡劣關係。雖然港同盟聲明不會干預其他與香港無關的事務，但是港同盟與支聯會的成員重迭，致使中方對港同盟抱着不友善的態度。從實際的政治角度分析，這關係對港同盟在將來的發展中大大不利。

自民聯

自民聯的核心成員主要是一批商人及專業人士。除了副主席譚惠珠過往在政壇較為活躍外，其他的核心成員的表現似乎比較低調，較少參與基層的社會運動，明顯地缺乏了群眾基礎。以九一年區議會的選舉為例，某些候選人不強調自己為自民聯的成員，作為一個政治組織的

成員，在一個直接的政治選舉中，不以此身份來宣傳爭取選票，這反映出組織中的成員認同感不足，或是恐怕這身份反會帶來負面的影響。從這例子中可見自民聯面對最大問題是缺乏群眾基礎，這是將來發展的重要阻礙，自民聯的核心成員需要檢討目前的策略，本身應積極點對公共政策發表意見，從而在群眾中建立自己的形象，正如西方國家的政黨領袖十分重視確立本身的形象，爭取選民支持。

自民聯與中國的關係是它較有利的發展因素，核心成員與中國沒有敵對的關係存在，這是由於北京十分看重香港商人的投資能力及信心，而工商界也很了解中國政府對香港的影響力，不會與中國政府直接衝突。正如上文（客觀因素）的分析，我們可以知道中國政府對將來政黨的發展是有決定性的影響。因此組織的核心成員與中國保持良好的關係，對本身的發展是十分有利的。

滙點

滙點成立於一九八三年，根據其中提供的資料中，有九成的會員是大專畢業甚至擁有更高的程度。滙點的核心成員大都是學者，他們一般都支持推行民主政制，故此也被稱之為「民主派」。

相對港同盟來說，滙點對民主的爭取手法比較溫和，採取論政的手法，對一些政策上的問題，滙點的核心成員利用本身所擁有的理論知識進行研究，制訂長遠的政策方向。核心成員中有大批的知識份子，使滙點能夠深入探討較廣泛的政策性研究，這點可從其政綱的詳細內容分析中得到引證。作為一個政黨，最終的目標當然是執政，如果在執政之前能夠對現時的政策有深入的研究和認識，自然對其執政有極大的幫助。

可是，滙點在地區基層的聯繫似乎仍有不足，只局限於數個地區，這對一個標榜民主團體來說是一個頗大的問題。

滙點與中國的關係能保持不敵對，使其將來的發展頗為有利。滙點自立會以來，一直支持香港回歸中國，這民族立場給予了滙點與中方溝通的基礎。另一方面，滙點的核心成員是學者，中方一貫以來喜歡利用知識份子作為統戰對象，並且為顯示其尊重香港的「民主派」，故積極與其進行溝通。總括而言，滙點本身如能克服資源上的限制，擴大地區的關係聯絡網絡，建立基層的實力，其發展前景自是十分樂觀的。

(二)組織結構

雖然香港目前各政治組織還處於發展的初階，人事因素在現實政治的局勢發展中有很大的影響，但是本身的組織結構也是不可忽略的一環。一個組織內部的結構，如果能夠具有完善充足的溝通渠道，使組織內的各部份能清楚自己所發揮的功能，與其他部份互相呼應及配合，自然能夠提高政治組織日常運作的效率。同時，在遇上重大政治問題之時，例如外來局勢的轉變，致使組織內出現意見分歧，這便需要依靠組織的結構機制及具有約束力的憲章規條，理智地去面對處理意見上的分歧，減低人事因素變動所帶來的不穩定性，發揮結構機制的穩定功能，那麼組織在未來多變的政治局面中，能夠延續生存的機會自然大大提高。

自民聯（參看附圖一）

從圖一可見，常務委員會及執行委員會是組織內的權力核心所在，處理日常的決策事務，可是圖中沒有說明會員大會的位置及其與常委會的關係。根據圖一之上的《會員的權利和義務》一文中，我們可以看「主要政策由會員大會規定」。由此推論，會員大會應該是一個高於常務委員會的機關。

在常委與執委會之下，可分為三部份：(一)事務委員會(二)專責委員會及(三)地區功能委員會。從結構的角度分析，事務委員會及專責委員會如能按照本身的職責而發揮特定的功能，因時制宜地增減不同部門的資源分配，原則上是可以接受的，反而需要留意的是地區委員會。作為一個政治組織，在民主政制漸進發展的過程中，理應確立本身的基層實力，自民聯在地區基層的結構，仍未能針對這點而加以改善。地區委員會分為三部份，包括有港、九及新界，港九的面積雖然不算很大，但是人口稠密，每區之間各有不同的特點，而新界的情況更加明顯，不可能由一個委員會就能完全顧及各地域的基層事務。

自民聯最大的弱點是缺乏基層的支持，如果在結構組織上不加以補救，只虛設這些地區委員會，不在基層多做深化建設及宣傳工作，其結果只會重蹈九一立法局直選的覆轍。

另一方面，從圖一所見並沒有紀律及監察的組織，作為一個組織完善的團體，理應設有監察組織，避免會員出現漠視組織利益及決議的情況，甚至違反規章，試問擁有一群如散沙般會員的組織，能否有效地動員群眾，爭取市民的支持？一個獨立運作的監察組織，對一個正在發展中的政治團體來說，是十分重要的。

港同盟（參看圖二）

會員代表大會是港同盟的最高權力機關，轄下有中央委員會、評議會及紀律委員會。評議會及紀律委員會的主要工作是監察中央委員會及其會員的工作，而中央委員會轄下的中央常務委員會，處理日常的事務。

從結構上的分析，港同盟的組織本身可算完整，中央行政、監察、地區支部及功能支部等都有明確的劃分及界定。但是，若果這結構只是虛有其名，而在現實的情況下根本不能發展各部份本身的功能，令組織運作未能有效地執行各項的政策，結果也是徒然的。

滙點（參看其組織結構的簡介）

從這段文字中，可見滙點的結構與港同盟頗為相近，不過在地區支部不及港同盟在各區均有一定的基礎。但是，滙點的政策委員會卻是有很精細的分工，對他們的政策研究有很大的裨益。

政綱

對於政治組織來說，政綱可說是一個組織的靈魂，其代表了組織的意識形態，各成員的共同理想。基於這個原因，政綱自然是政團向市民宣傳的承諾，用以爭取支持。政綱是政治團體施行政策的思想指引，要了解一個政治組織，必先了解其政綱的要點。

滙點

滙點的政綱十分詳盡，一共有十三章。除了第一章外，其餘章內都設有(一)基本原則和立場(二)政策建議及(三)參考文件。

讓我們先看第一章基本信念，這章粗略地可分為三方面，由第一點至第四點聲明滙點支持香港主權回歸中國，但必須保持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立場。第二部份是第五點中提到的民主；第三部份由第六點至第八點，提出其對民生的意見。這是滙點立會以來一直所提倡的「新三民主義」，從這章中我們可知道滙點的重點所在，這思想引導對其政策的制訂及建議都有很重要的影响，及後的各章的內容均由這基本信念引伸而出，再加以闡釋補充。

此外，我們有一點需要特別留意的，就是其中有很多的具體建議，例如在第三章法律中提到設立一個獨立的司法人員叙用委員會，又例如在第四章經濟中所提到的稅制改革等，都顯示出滙點本身對政策的研究頗具深度，能夠在政綱中提出一些建基於本身基本立場的具體建議，並提供更詳細資料的參考文件，以便對政策建議有疑問的人可進一步了解滙點建議的背景及其理念所在，這比只提出空泛的口號及原則來得更為實際。

港同盟

港同盟在成立宣言中，提出四點宣言（及其中政綱），其中需要留意的是港同盟強調本身是立足香港的地方政治組織，無論介入香港以外的政治，由此可見港同盟明白到其主要的弱點是它有太多支聯會的成員在內，影响了它與中國的關係，因此在宣言中聲明本身立場，港同盟的目標只是在香港發展，避免不必要的障礙存在。這似乎是明智的策略，但最終還是要配合現實政治的具體部署。至於其餘各項，都只是提出一些空泛的概念，爭取民主、保障人權法治、提高市民的生活質素等，這些理想原則在組織發展的初期，還可接受，但如果希望執政的話，這些能否充份反映其意識形態，作為執政的基礎，實成疑問。

自民聯

在自民聯的政綱中，提出了十三點的具體做法，達至其工作目標——維持安定繁榮和提高市民生活質素。第一點我們可以看到其建議香港及中國政府應立聯繫及訂立配合的政策，以維護社會秩序，這反映出自民聯本身十分重視與中國的利益關係。

一直以來，自民聯被稱為工商派、偏重工商界利益，但從其政綱中可見有不少的做法均強調顧及勞工階層的利益，例如第二、第四、第六及第七點等，從住屋、醫療、福利制度及管制公共事業等措施改善基層市民的生活。如果盲目批評自民聯漠視基層市民的利益，似乎有點不公平，我們應該從理智客觀的態度去觀察，自民聯如能真正盡力爭取落實這些建議的話，我們也不應偏激地批評自民聯為只重視工商界的政治組織。

最後，綜合以上三方面的分析，讀者可能持有不同的意見及觀點，但無論如何，這篇文章的目的是希望大家讀過這篇文章後，能引發起大家的思考，從而得到自己的結論及啟示。



ACE CONSULTANTS

4th Floor, 444-445, Block 5, San Po Kong Factory Estate, Kl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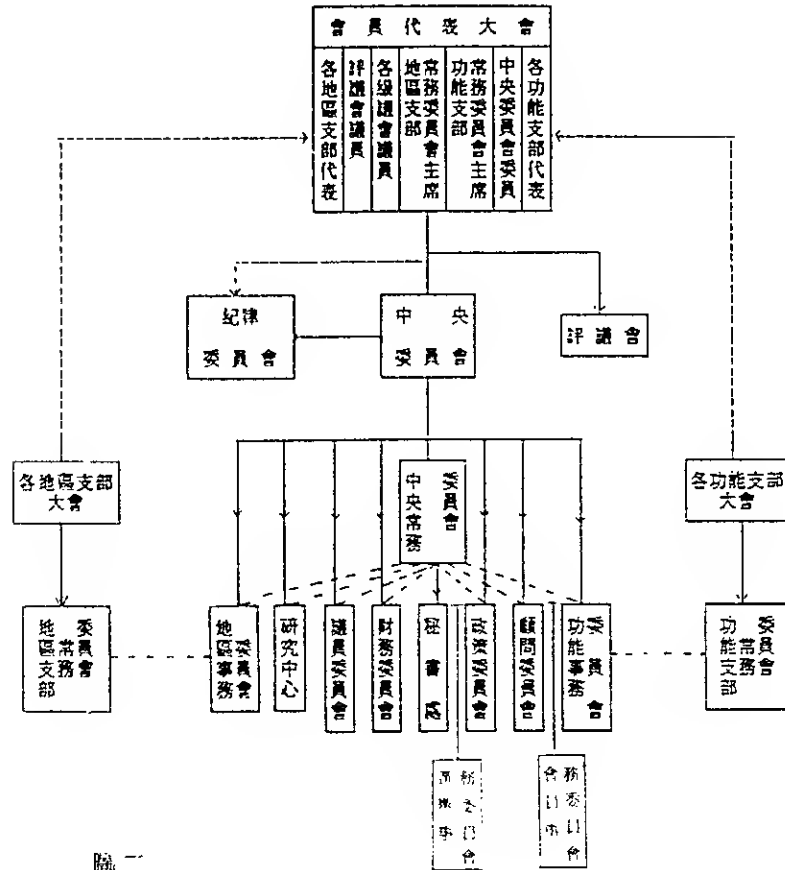
Tel: 306-1006

Fax: 352-2494

貴為大專學府的一份子，閣下努力不懈，憑藉堅毅信念，在學業上表現卓越。ACE Consultants 擁有一批專業人士，幫助閣下選購一部為你度身訂造的個人電腦。

作為明日社會棟樑的你，理應需要一位助手，一部設備完善的電腦，才能勝任此職。因此請盡快聯絡本公司（電話3061006）之專業服務，選購一部助你成功之個人電腦。

香港民主同盟組織結構圖：



圖二

鳴謝

張炳良

郭志權

李柱銘

黃紹倫

譚超雄

羅致光